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 高度契合的内在逻辑

郭金龙¹, 胡 爽²

(1. 开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2. 南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南阳 473061)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之间呈现显著的高度契合性,其中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理论层面,二者虽源于不同社会形态,但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诠释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历史层面,通过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二者在“两个结合”进程中实现了社会根基的历史性转换与价值内容的深度融合;现实层面,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战略需求与对现代性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二者结合的时代必然。因此,这种契合性并不是简单的内容或者概念上的相通或对照,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相通性、历史实践性以及现实必然性。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高度契合

[中图分类号] D61; B222;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3-0126-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3.04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同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二者在本质上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规定,但是源于两种不同社会体系的价值主张何以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如何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两者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的重要问题。

一、高度契合的理论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衍生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并且由这种历史存在所规定。而科学社会主义生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进而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运动。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于中国古代落后的社会关系中,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不乏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这为两种价值主张高度契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社会历史存在的正确反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自然经济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时期,还是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或者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尚处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式中,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实践活动必须依赖于他人,人的活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一刻也离不开群体活动。作为人与

人之间的依赖性自然是自然的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社会形式在经济上表现为自然经济社会,社会交往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体内部所进行的交往活动,群体依然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普遍的广泛的社会交往还没有形成。所以,人的生产活动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展开,这充分说明了个体对群体的天然依赖性。在政治上,这种依赖性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即借助权力的形式实现这种社会关系的有序进行。中国古代这种客观的社会体系反映在社会意识层面,也就呈现出了基于人依赖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内容,在根本上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客观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从其作用的不同性质上看,这种反映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是精华部分,另一种是糟粕部分。作为精华部分实质上是对特定社会存在的合理适配,既贴合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又蕴含人类共同的生存智慧,且能跨越时代,在现代社会依然与先进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相容。而糟粕部分,本质是对社会存在的片面反映或扭曲适配,仅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落后生产关系,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一定时期它有利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历史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意识内容受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规定和制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意识内容将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表现出阻碍作用。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下的产物,是有限的和狭隘的社会意识内容,不能反映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能体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它的生命力无法超越自身的社会存在属性。

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反映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属性,在原则高度上超越了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规制,符合人类社会发

收稿日期:2026-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研究”(项目编号:25BKS119);2026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研究项目“中原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6JYQS3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金龙(1986—),男,河南开封人,开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要求,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二)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反思性审视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考察中所得出来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剖析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在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向我们阐明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历史运动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映现,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反抗私有制关系的运动,也是无产阶级争得自身解放的运动,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具有科学指引性和道义感召力的价值形态”。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最能够反映人类社会诉求的科学理论。

因此,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生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前者是对自然经济关系的反映,后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审视,二者反映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存在,但是二者的一定程度上都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在历史的时空坐标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其中不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在规律的正确的一般性认识,在这个层面它已经超越了原生的落后的社会存在,是能够跨越时空和区域的价值理念,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特征。这是二者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的“契合之本”。

二、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契合源于历史实践。作为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社会意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不同时代对其进行的现实解读与运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发生根本转变,使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同汇聚于这一伟大实践,从外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观念,转化为内生于中国实践的意识内容,既实现了二者价值主张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融合,又实现了二者价值主张之间的内在交融。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实践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民共同孕育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所积淀的文明结晶,是饱含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进行伟大创造的实践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表现为特定社会存在,以及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这就意味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创造优秀文化。虽然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由此来看,当我们把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文化,从其原生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剥离时,这个时候,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不再限定于原生的社会关系基础,而是衍生在了新的社会关系架构中。如此一来,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由于场景的变化,优秀传统文化也就超越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而植根于新的社会关系中。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生成的结果,它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某一特定的或者其原生的社会关系中,而普遍在于不同历史时期所构成的历史长河中,植根于整个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就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内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而才表现出历史继承性,历史继承性的前提就是通过历史实践实现内生性转化。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实践的结果,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得到时代的阐释、解读和运用,在现实中不断实现内生,进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根基就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越几千年,沿着历史的进程传承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根基和生命力,在时代的阐释、解读和运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的内生性转化。这种转化并不是简单的文化继承和运用,而是具有真实且深刻的历史实践根基存在。换言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从其本质上讲,它已经历史性地隶属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社会意识范畴。正是在这个层面,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内在的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习近平指出:“我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科学社会主义植根于历史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吸收借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不是简单的外在思想理论的运用,而是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的历史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来到中国,就预示着中国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理论武装,也带来了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且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改革开放后,历经几十年的不懈探索,我们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成功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了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经一个多世纪,我们用自己的实践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已经内生为中国无产阶级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理论武装,已经内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因此,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不是抽象的社会意识范畴,而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意识范畴,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在历史实践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融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是二者能够融通的现实根基,它们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所规定,并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互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实践中能够实现融通,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二者的价值主张在内容层面需要有高度的互通性和互融性。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就告诉我们,二者的价值主张具有高度互通互融的内容。首先,二者在世界观层面存在互通互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世界万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强调宇宙是一个整体,人与自

然相互依存,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以及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充分说明了古人也认识到了世间万物彼此联系、相生相克,洞察到了事物之间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当然,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本质上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甚至其中夹杂着些许宗教神秘色彩,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诸多规律存在着互通之处。其次,二者在人生观层面存在互通互融。中国古人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能够辩证的看待人生矛盾。《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体现了古人高尚的人生追求。这些与科学社会主义中所蕴含的人生观内容同样高度互通,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的安放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然后,二者在实践观层面互通互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诸多关于实践的智慧,《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荀子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都说明了古人对实践的重视,这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实践观同样存在互通之处。最后,二者对未来社会的希冀互通互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着古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这和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追求有着高度的互通之处。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衍生于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以分散的思想观念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前人所创造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在的蕴含着诸多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内容,也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彰显的价值主张。可见,二者的价值主张在内容层面具有高度的互通性和互融性。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离不开历史实践,在历史实践中基于二者价值主张高度互通的重要内容,两者不仅实现了社会存在场景的转换,完成了植根新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内生性转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二者的价值主张不断实现交融。

三、高度契合的现实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背景下,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十字路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该如何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现实课题,这也正是两种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的现实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相互结合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迫切。从世界维度看,资本主义危机频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活力,“东升西降”趋势显现,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文明面临抉择。从国内维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历史与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唯有持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深化“两个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为我们破解时代课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度融合,既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历史与实践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唯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唯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焕发出鲜明的现实活力。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当于“根”,科学社会主义相当于“魂”,二者的结合是内在的彼此成就,也是现实的实践所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对工业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相通的批判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虽然在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理论基础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确实呈现出深层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既体现在对物质异化的警惕、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中,也展现在对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上,共同构成了对工业文明结构性矛盾的反思。

首先,这种相通的反思性表现在对“人的异化”的双重解构上。工业资本主义将人异化为生产工具和消费符号的困境,在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框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中受到双向批判。儒家强调“君子不器”,反对将人降格为功能化器具,道家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警惕人被外物所奴役。这种人文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异化”和“物化”的现象形成共鸣——当劳动者在流水线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时,恰如王阳明所言“逐物则心失其正”,人性的完整性与创造性被资本逻辑肢解。其次,二者相通的反思性还表现在科学社会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幻本质,与中华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形成跨时空的对话。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表达背后,实为对无止境物欲的警惕,而《资本论》中揭示的交换价值吞噬使用价值的过程,正是这种物欲膨胀的制度化结果。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格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神秘性”的追求,共同指向对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超越。最后,二者相通的反思性还体现在自然观方面。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将人与自然视为有机整体,反对主客二元对立。这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形成呼应,两者均强调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的根本制约性。儒家“仁民爱物”的伦理思想,将道德关怀从社会推及自然,暗合科学社会主义中人与自然关系即人与自身本质关系的命题。可见,二者的价值主张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思具有深层的相通性,而且,这种相通性并非简单的概念对应,而是根植于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普遍性。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获得现实实践路径,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支撑。二者的结合不仅为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双重视域,更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发展出具有新的文明形态的现代化方案。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的高度契合,并不是简单的内容对照或者概念对应,这种契合性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既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基础,也离不开历史的实践进程,更离不开现实的实践必然。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先在契合”性逻辑,构成了二者的价值主张高度契合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2]郑敬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运行机理[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4(1):26-31.

[3]陈红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7):83-92.

[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9.

[5]列宁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9.

[6]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8.

[7]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6.

[10]陆卫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逻辑向度[J]. 探索,2024(3):127-141.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High Compatibility Between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Value Proposition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GUO Jin-long¹, HU Shua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Kaifeng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2. School of Marxism,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remarkable and high degree of alignment between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value proposition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a profound internal logic.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lthough the two originate from different social formations, there is a certain commonality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d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historical level,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actic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wo have achieved a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undations and a deep integration of value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strategic need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odern civilizatio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ir combination. Therefore, this alignment is not merely a correspondence or analogy in content or concepts, but entails profound theoretical commonality,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contemporary necessity.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cientific socialism; value propositions; high compatibility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125页)

Value Analysis and Path Exploration on Integrat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to the "Ext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U Guo-y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evolution of the century-old changes and profound shift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dscape, deeply integrat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to the "Ext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crucial measure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two are highly compatible in terms of value objectives, content systems and practical links. Their integration bears significant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curricular values. To this e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a systematic approach, build an extensive classroom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combin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education, establish an extensive platform by integrating university-local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resources to expand practice fields for integra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and strengthen teaching staff by forming a diversified teaching team with full-time and part-time collaboration. Ultimately,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will be fully covered in all staff, whole process, and all dimens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ivating new-era individuals equipp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 literacy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ext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责任编辑:桂杉杉)